



外教社
博学文库

淡妆浓抹总相宜： 明清传奇的英译研究

A Kaleidoscope of Aesthetic Realization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uanqi* Dram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潘智丹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本书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研究

A Kaleidoscope of Aesthetic Realization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uanqi* Dram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潘智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研究/潘智丹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外教社博学文库)

ISBN 978-7-5446-2826-6

I. ①淡… II. ①潘… III. ①传奇剧(戏曲)-中国-明清时代-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8017 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李振荣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1/32 印张 15 字数 428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46-2826-6 / H · 1375

定 价：43.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博学文库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姓 名	学 校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腊宝	苏州大学
王 蓓	北京师范大学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石 坚	四川大学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世生	清华大学
杨惠中	上海交通大学
何刚强	复旦大学
何兆熊	上海外国语大学
何莲珍	浙江大学
张绍杰	东北师范大学
陈建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秦秀白	华南理工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黄源深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程朝翔	北京大学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戴炜栋	上海外国语大学

出版说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始终坚持“服务外语教育、传播先进文化、推广学术成果、促进人才培养”的经营理念，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创新精神，多年来已推出各类学术图书 600 余种，为中国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展示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并为广大优秀的博士人才提供广阔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外教社博学文库”。该文库遴选国内的优秀博士论文，遵循严格的“专家推荐、匿名评审、好中选优”的筛选流程，内容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和教学法研究等各个领域。该文库为开放系列，理论创新性强、材料科学翔实、论述周密严谨、文字简洁流畅，其问世必将为国内外广大读者在相关的外语学习和研究领域提供又一宝贵的学术资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序

潘智丹副教授的专著《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研究》即将付梓，这是她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反复修改而成，经评审已纳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教社博学文库”系列，是一个来之不易的荣誉，也是对她学术水平的充分肯定。博士论文最后成书出版，通常会由导师在前面写几句话，似乎已经成为惯例，本书的内容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读者可以自己阅读，我谨借此机会，写点既跟本书有关、又有点题外的话吧。

潘智丹是大连外语学院旅游学院原院长葛玲芬教授向我推荐的，葛玲芬教授是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学生。之所以要提到她，因为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是出名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这里绝对是个褒义词），教学和工作尽心尽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或徇私舞弊，她说的话绝对可以相信。她向我推荐了潘智丹，并且说这是她一辈子唯一推荐过的博士生候选人，说她是个好苗子，后来事实也证明是这样。

潘智丹攻读博士期间，我发现她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有悟性，一个是肯吃苦。她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典籍英译”，要从事中国典籍英译实践，很重要的一条是在英语表达方面要有语感，这一点恐怕要有一点天赋，不是所有的人用功以后都能做好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在她博士学习期间有意识地让她参加了七八本书的汉译英工作，有的是跟我一起做，多数是她独立完成，然后我给她审定。在就读的三年时间里，她能完成

II

那么多翻译作品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由于她以前翻译理论接触不多,需要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她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看书到半夜以后。说实在的,我的几个弟子都很用功,而且相互切磋,直到现在还常有来往,我也感到很欣慰。她选择的方向是明清传奇的英译,这是一个冷门的题目,因为有关戏剧翻译的理论著作本身就比较少,有关明清传奇英译的更少。在参考材料比较少的情况下,她的论文完成了,在答辩的时候反响也不错,得到了答辩委员会成员的一致认可和赞扬。

明清传奇英译的实践和研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在好几千个剧本中,很多值得向国外介绍,除了《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等少数剧本以外,大多数都还没有英译本,仅筹备中的《昆曲大典》就有 418 个折子戏需要翻译。我本人近十年翻译了《汤显祖戏剧全集》,为上海昆剧院、浙江昆剧院等翻译了 20 多个剧本和 50 多个折子戏,从全国范围来说,从事古典戏剧翻译的人毕竟非常少,可做的事情非常多。我纵然现在还有宏大的计划,想多翻译一些剧本,但是毕竟年事已高,衷心希望潘智丹能够继续她攻读博士期间的课题,把中国古典戏剧翻译工作做下去,在中国古典戏剧翻译领域逐渐树起一面新的旗帜。

我之所以在戏剧翻译实践这一点上多写几句,是因为潘智丹毕业后已经开始讲授大量课程并且接手一定的行政工作,学校的科研评估体系又是以项目为重,以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为重,评职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明清传奇的翻译更是高投入、低产出,女老师还要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做大量的家务,非得有恒心、耐得住寂寞才能把中国古典戏剧翻译工作坚持下去。她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还要拭目以待,不过我对她充满信心。

祝她成功!

汪榕培

2012 年 4 月 4 日清明节于苏州幽兰斋

前言

1. 本书的写作缘起

本人目前为大连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基地成员，故而有机会完善并出版《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研究》一书。《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研究》原本是我的博士论文，选择明清传奇的英译作为博士学习阶段的研究对象绝非偶然，多方面的因素最终促使我做出这个选择，但其中也不乏机缘巧合。

翻译是我的兴趣所在。1998 年我开始在大连外国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有幸参加了两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很早就有了署有自己名字的译作。早期的翻译实践让我对翻译有了一定的认识，也对自己能否从事翻译工作有了基本的判断。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对汪榕培先生的崇拜又坚定了我选择翻译研究的信念。我的导师汪榕培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典籍英译名家，他所招收博士的方向是典籍英译，在国内可谓是凤毛麟角。初次接触“典籍英译”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很迷茫，因为“典籍”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实在太遥远，它似乎是一个普通人无法触及的领域，似乎是一座空中的象牙塔。但跟随汪榕培先生读书、做研究，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对“典籍英译”的恐惧被我毫不犹豫地抛在脑后。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终于成为汪榕培先生的入室弟子。

获知这一喜讯的那一刻，一个念头立即在我脑海中闪现：我要跟汪榕培先生学习什么呢？

自儿时起，我对戏曲便有着浓厚的兴趣，评剧、二人转、豫剧、沪剧，尤其是京剧和黄梅戏，百听不厌。而我还在大连外国语学院读本科的时候就有耳闻，汪榕培先生对戏曲也有着强烈的爱好和执着的追求，先生甚至多年订阅京剧方面的期刊。这种兴趣上的巧合，让我萌生了研究戏剧翻译的念头。通过跟汪榕培先生其他博士生的接触，我进一步了解到，先生确实对戏剧和戏剧翻译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希望能有博士生选择这一研究领域，但至我成为先生的弟子之前，的确没有人研究戏剧翻译。了解到这一点后，研究戏剧翻译的念头便越来越强烈。

开始跟随先生学习的时候，我跟先生提出了选择戏剧翻译研究的想法，先生便让我了解一下中国古典戏剧，从中选取一个切入点。于是 I 我开始了初步的调研工作，一方面开始了解中国古典戏剧的历史，一方面考察中国古典戏剧的英译情况。通过最初的了解，我发现《西厢记》的英译本颇多，从语料的角度应该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便跟先生说明了这一想法。当时先生略有沉思，然后说《西厢记》属元杂剧，而元杂剧在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仍属于不够成熟的阶段，戏剧元素比较简单，不利于研究的深入进行。听了先生的话，我意识到自己对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入，于是开始仔细研读有关中国古典戏剧的资料。通过进一步研读，我了解到，中国古典戏剧经历了元杂剧、明清传奇和地方戏三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其中明清传奇的作品最多，繁荣期最长，创作理论最成熟，甚至代表了中国古典戏剧理论的发展成就。它不但成就了汤显祖、孔尚任、洪昇等一代戏剧巨匠，也培养了沈璟、王世贞、王骥德、吕天成、何良俊、李渔等著名戏剧理论家，成为最能体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戏剧形式。基于这些考虑，明清传奇应该是研究的最佳选择。这次，当我向先生提出研究明清传奇的英译时，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想法，并且饶有兴致地说：“你可以一边研究理论，一边做翻译实践，明清传奇的剧本你这辈子都翻译不完。”现在回想起来，我能体会先生当时的愉悦心情，因为在先生心中，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从来都是并重的，一个好的翻译研究者必须多进行翻译实践。这些都是我跟随先生翻译了多部作品后深深

体会到的,先生对翻译实践的执着和坚持,最终成就了先生翻译大家的美誉。

就这样,我选择了明清传奇的英译作为自己博士期间的研究对象,也选择了明清传奇的英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作为我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本书的研究范围

本书题为“明清传奇的英译研究”,其研究范围不言自明;然而,“明清传奇”的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争议性,需要进一步界定。

在中国文学史上,“传奇”一词具有多种内涵,在不同时期曾指称多种不同的文体,如唐代传奇(文人创作的短篇文言小说)、宋代民间艺人集体创作的短篇白话小说、宋金说唱文学中的“诸宫调”、元人的北曲杂剧、宋元南戏、明代中叶经魏良辅革新的昆山腔系统的剧本和清人所编戏曲目录中包括的元明清的长篇剧本。自五四运动后,传奇基本上指称两种文体:唐代的短篇小说和明清的长篇戏曲,即唐传奇和明清传奇。然而,为明清传奇定义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困难主要在于传奇与南戏之间存在演化关系,二者很难截然分开。

本书综合了多位学者的观点,同时也考虑到翻译研究的具体特点,对传奇的定义做了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从典籍翻译中的“典籍”概念出发,研究的文本对象应该具有传承的价值,应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水平和精华成分。因此,虽然明清传奇包含民间传奇、宫廷传奇和文人传奇三个部分,但就文学价值而言,民间传奇和宫廷传奇显然不可与文人传奇同日而语。鉴于此,本书研究的传奇首先要属于文人传奇。《琵琶记》是文人染指传奇创作的开篇之作,且其文风对以后传奇作品的影响极大。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出发,应该考虑的是要研究的文本的基本特征是否一致,而从《琵琶记》开始到明万历以前的传奇作品,在文本的基本特征上很难与之后的传奇作品划分开来。考虑到这些因素,本书中的传奇指的是自《琵琶记》开始所有文人创作的传奇作品。

3. 本书的研究目标

明清传奇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后期阶段的典型代表,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戏剧形式,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是,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翻译界,对明清传奇的研究都不够充分。本着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旨,本书力求构建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

“任何翻译理论体系都必须(也必然)以某种特定的原语和目的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依据和依归”(转引自刘宓庆,2005a: 24)。本书要构建的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是以明清传奇的创作语言,即中国明清时期的古代汉语为原语,以英语为目的语。案例研究采用的原文本,为代表明清传奇不同时期的巅峰之作——高明的《琵琶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四部传奇剧目,目的文本采用的是让·墨里根(Jean Mulligan)的《琵琶记》译本(*The Lute*),汪榕培、张光前和白芝(Birch)的三个《牡丹亭》译本(*The Peony Pavilion*),杨宪益夫妇及贺清滨的两个《长生殿》译本(*The Palace of Eternal Youth*)以及陈世骧(Chen Shih-hsiang)、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和西里尔·白芝(Cyril Birch)合译的《桃花扇》译本(*The Peach Blossom Fan*),共七个英译剧本。

《琵琶记》是明清传奇的发轫之作,堪称“传奇之祖”,开创了明清传奇的诸多文学传统;《牡丹亭》是明清传奇发展中期出现的一部宏篇巨制,其影响经久不衰;《长生殿》和《桃花扇》是明清传奇发展后期的巅峰之作。根据原型理论,这四部剧本都可以说是明清传奇的中心例子、好例子,都可以作为明清传奇这一类型的放射性结构中央的认知参照点。本书针对明清传奇的文本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而《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这四部剧本都具备这些文本特征中的大部分成分;此外,这些戏剧文本的七个平行英译本也基本都出自优秀的翻译家之手,都是好的示范型文本。正如好的原文本能更好地体现原文本的原型一样,好的目的文本也能更好地反映该类型文本的翻译现状。挑选好案例研究所用的文本,从某种程度上说,就等于把量的分析转化成质的分

析,而当理论研究能同时兼顾量的分析和质的分析,其理论建设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从应用性的角度看,本书首先在具有原型效应的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明清传奇的英译理论的宏观和微观研究,然后在理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构建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借以阐释明清传奇翻译活动中古代汉语和英语之间转换的各种规律和翻译运行机制。但是,理论与模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罗杰·贝尔(Roger Bell)的观点,“理论是对现象的解释,是对所观察事物的系统及规律的感知”(廖七一,2000a: 217),而模式则是“这一解释的外在表达,是理论的现实化”(同上,2000a: 217)。另外,模式虽然具有解释和描述的功能,但需要有实例来验证其有效性,验证过的模式才能成为更为稳定、解释力更强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模式不应该对翻译现实进行静态描写,而要把焦点放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因素上。因此,本书构建的明清传奇的翻译模式,将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各层次相互作用的范式,其正确性还可以在未来的明清英译实践中得到不断的检验及完善。

4. 本书的研究思路

语言学发展到现代阶段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从规定性研究转变为描述性研究,受此影响,翻译研究也逐渐从规定型转向描述型。进行翻译描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译者将原文本转换为目的文本的翻译过程进行客观分析和说明,即翻译转换研究,这样可以兼顾对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的研究。翻译转换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易出现问题的转换,这些转换才真正具有价值。为了寻找这些有价值的翻译转换,首先要对原文本进行特征分析,通过分析归纳出原文本区别于其他类型文本的特征,以及在目的文本中无法找到的在意义及形式上与之对应的特征。研究翻译转换过程中要引入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规范,事实上,规范是描述翻译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规范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转换过程中采取的普遍策略,因此理论往往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之上。为了更系统地描述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为了更全面记录翻译转换的实际情况,

为了更准确发现翻译实践中译者遵守的翻译规范,语料库理论被引入翻译研究领域。语料库的自身特征决定它天生适合描述性翻译研究,尤其是对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的研究。因此,本书的研究方法,以描述性翻译研究、翻译转换、翻译文本分析、翻译规范和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为理论基础,五者相互联系,在逻辑上互为依托,共同构筑了明清传奇英译理论建设的坚实底座。

描述翻译学有三个研究方向:产品研究、功能研究和过程研究。对翻译产品的描述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因为本书以《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四个传奇剧本的七个英文译本为研究对象进行翻译描述,而这七个译本首先是翻译产品。与此同时,本书旨在通过观察目的文本中原文本特征的转换结果,推测这些特征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移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过程研究也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二者都是描述翻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描述翻译学的功能不仅是对翻译实践进行观察和描述,更重要的是描述翻译研究的结果将被用来建立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即描述翻译研究的结果将最终被用于翻译理论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分为普遍翻译理论研究和部分翻译理论研究,部分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是“作为整体的翻译理论的一个或几个不同方面”(Holmes, 2007a: 73),即在不同方面受到限制的翻译理论,包括受媒介限制的翻译理论、受范围限制的翻译理论、受语言层级限制的翻译理论、受文本类型限制的翻译理论、受时间限制的翻译理论和受问题限制的翻译理论。本书所研究的明清传奇的翻译理论,指的是关于明清时间段的传奇戏剧类型文本的、由汉语译入英语的翻译理论研究。

进行翻译描述,首先要清楚译者是如何进行翻译活动的。霍姆斯首先确立了译者的翻译过程模式,并建立了三套规则:衍生规则、匹配规则和投射规则。其中衍生规则决定“译者从文本本身归纳出原文本图谱的方式”(Holmes, 2007b: 84),匹配规则决定“译者根据原文本图谱建立目的文本图谱的方式”(同上, 2007b: 84),投射规则决定“译者利用预期的目的文本图谱规划文本的方式”(同上, 2007b: 84)。这三套规则中涉及了三个过程,其中利用目的文本图谱规划文本的过程是真正的翻译操作

过程。

研究者的翻译描述工作同译者的翻译实践不同,研究者必须回溯译者的整个翻译过程,包括确定译者建立的两个图谱,以及译者在形成这两个图谱的过程中采用的三套规则。问题的关键是,研究者一般掌握的材料很少,只有原文和译文,只能以此为基础,从中推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形成的原文本和目的文本的图谱,即原文本和目的文本中的各种特征,以及二者之间的匹配规则。

翻译转换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原语翻译到目的语中发生的细小变化”(Munday, 2001: 55),或者“翻译过程中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变化”(Bakker 等, 2004: 226),而按照波波维奇的观点,“目的文本中出现的一切对于原文本来说是新的成分,或目的文本中预期应该出现而未能出现的一切成分都可以被理解为转换”(Popovič, 2007: 163 - 4)。可以说,翻译转换概念的核心是“变化”或“差异”,它们可以发生在任何层面。产生转换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两种语言、两个作者和两个文学情境的差异”(Popovič, 2007: 163)。当两个系统发生碰撞时,译者必须针对这些因二者的差异带来的问题采取某种策略,他们或者要尽力保留原文本的规范,或者要表现个人的创造力,但是不管译者如何想要忠实于原文本,其结果都会导致译文中出现各种变化。可以说,“变化”在翻译中是一种必然现象。

翻译转换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研究视角不同,翻译转换的类型和层次也不同。在使用翻译转换分析法之前,研究者必须明确其研究目的,从而确定需要描述何种类型的翻译转换。总的来说,翻译转换的描述对象,既可以是翻译过程也可以是翻译产品,但有时很难把过程的描述研究和产品的描述研究明确区分开来。因为与翻译过程相关的因素可能在翻译产品的描述中发挥作用,而翻译产品的研究是描述翻译过程的一个主要手段。但无论是进行哪种翻译转换研究,往往要确立一个不变的恒量,因为转换是“变量”。在原文本和目的文本的各自系统中都存在一定的规范,这些规范的存在使两个文本在各自的系统中具有区别于其他体裁文本的特征。原文本系统的规范就是恒常因素,它们时刻约束着译者的翻译行为和翻译策略。因此,在运用翻译转换进行翻译描述

X

时研究者必须辨别原语系统的规范,即原文本的独特特征,而辨别原文本特征的工作就需要借助以翻译为目的的文本分析。

一般说来,以翻译为目的的文本分析,主要指的是在实际翻译过程之前对原文本的各种特征进行的分析。大多数翻译理论家都认为,译者在进行翻译之前只有通过文本分析,才能确保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原文。描述翻译学是对翻译实践的描述,既然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要经历文本分析的过程,描述翻译学必然要对此过程进行研究。根据霍姆斯的观点,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第一个步骤包括原文本图谱的获得,即分析原文本具体特征的过程。而且,文本分析能够提高翻译描述研究工作的主体间性。

为了提高主体间性,霍姆斯提出了两个工作方法。使用第一个工作方法时,描述研究者通常在分析两个文本的基础上,获得一系列自己认为重要并值得比较分析的特征,还很可能将这些特征按等级排序。在这个过程中,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必须具备详细的语言、文学和社会文化理论知识,这样才能识别文本中能为其他学者接受的上下文成分、互文性成分和情境成分,从而使分析结果具备些许主体间性,但这种方法提供的文本特征很可能不全面。第二个工作方法能克服前者的弊端,而且主体间性十分高,它要求研究者在分析具体文本之前,预先确定一个始终需要分析的特征库,但这个方法本身又有自己的缺陷:要确定这样的特征库就必须使该特征库所包含的内容尽可能广泛,从而导致提供文本细节的任务十分艰巨并枯燥。事实上,霍姆斯和其他学者的观点一致,都是试图找到适用于一切文本的普遍特征类型,这一目标太过理想化,一个普遍适用的文本特征类型库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不过,虽然不同类型的文本具有不同的特征,有些类型的特征具有普遍性,但是其中包含的具体特征是因地制宜的,在考察某种文本类型的特征时,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现代翻译学的思想,翻译规范与翻译理论的构建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翻译理论能够通过对翻译规范进行综合化和抽象化的处理获得。翻译规范不但是翻译描述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翻译理论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翻译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范围内,因此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不同的约束。图里认为,所有的社会文化约束形成了一个具有两极的连续体,其中的一个极端是普遍的、相对绝对的规则,另一个极端是纯粹的个人风格。在两极之间有一段中间地带,存在于这个区域的主体间性因素就是通常所说的规范,这些规范以连续体的形式排列起来,有的规范具有更强的约束力,有的规范的约束力则较弱,较强的规范更接近规则,较弱的规范更接近个人风格,而且不同的规范之间的界限并不鲜明,强与弱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翻译过程涉及两种语言、两个文化体系,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面对两套规范系统,而且这两套规范系统往往是互相冲突的。在图里(Baker, 2004: 164)看来,在这两个规范系统的碰撞中,译者作为一个信息交流者始终处于做决策的过程中,并且译者并不是孤立地从事翻译活动,他与周围的其他译者构成了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中译者与其他成员一样要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其翻译行为需要受到所在团体的约束。另一方面,规范强烈要求团体成员按照大家普遍认为“正确的”或“适当的”方针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规范中“包含一定程度的社会和心理压力”(Hermans, 2007: 31),它“或者来源于某种社会压力,或者来源于个人认同该规范的态度,或二者兼而有之”(廖七一, 2000a: 312)。与此同时,规范还具有宽容性。赫曼斯(2007: 31)曾指出,规范并不会对不遵循规范的个体成员采取制裁行为,尤其是当违反规范的行为并不是长期并大规模地出现;反之,如果个别成员不遵守某个规范,这并不意味着该规范已经失去约束力。事实上,规范的宽容性也直接导致了规范的复杂性。规范不但不稳定,并且多种规范可能同时共存。规范的宽容性允许不规范的行为发生,同时参与翻译活动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发挥个人的主观创造性,结果可能导致偏离规范的行为。当这种偏离规范的行为逐渐积累到一定程度,原有的规范就可能被颠覆,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有规范的消失,旧的规范被新的规范取代的过程总是比较漫长的。

从规范的概念和特性可以得知,翻译规范对于描述性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原语系统和目的语系统中都存在规范,两

套规范之间存在差异,差异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碰撞、造成冲突,译者在解决两个系统之间冲突的过程中往往会做出一系列决策,其结果又会形成从普遍到个性化的一系列翻译行为,翻译规范随之产生,而这些行为的结果反映在译文上就是导致翻译转换的出现。描述性翻译学的任务,就是对于这些在翻译现实中发生的现象进行描写和解释,翻译研究者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提出新的假说,建立新的理论模式,最终形成新的翻译理论。正因为如此,本书必须把翻译规范纳入研究范围,因为只有通过研究明清传奇原文本和英语译文中存在的规范,通过翻译转换重建翻译规范,才能提出假说,进而建立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

研究规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确认翻译规范。一般情况下,“研究者需要通过研究大量的真实翻译语料和识别规律性的翻译样式来辨别翻译行为规范,包括识别语料中译者通常选择的策略类型”(Baker, 2004: 164)。当然,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辨别翻译规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因为翻译规范很难通过观察翻译行为直接获得。首先,影响翻译行为的因素很多、很复杂。规律化的行为可能是受规范支配的结果,也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还可能是规范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可能“没有意识到任何翻译规范的存在,而是按照自己的倾向、判断、喜好或凭着自己的机智进行翻译”(Osers, 1998: 60),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译者没有在潜意识中受到规范的影响。因此,研究者不但要分析文本材料,也要分析文本外材料,例如译者、编者、出版商的前言,其中通常含有对于翻译规范行为的叙述。此外,在确认翻译规范的时候,研究者还要考虑译者所处的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其次,一个翻译行为可能是多个翻译规范作用的产物,因此在确认不同类型的翻译规范时还要辨别其约束力的强弱,即不同的规范在系统中所处的是中心地带还是边缘地带。简单地说,就是要给不同的规范“建立一个等级次序,确定哪些规范的等级高,哪些等级低”(Karamitroglou, 1994: 25),等级高低代表了规范的约束力的强弱。

确认规范后的任务是重建规范,即重新表述规范的内容。完成这个步骤需要清楚规范概念的三个要素:“决定主体的要素,表明需要遵循该